

社会主义的 政治与经济

W·布鲁斯著 何作译 绍文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17 9685 0

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

W·布鲁斯 著

何 作 译 绍 文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17 9685 0

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¹/₄印张 122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册

统一书号: 4190·084 定价: 0.54元

中文版序言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中译本撰写这篇简短的序言。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于社会主义和整个世界的前途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本书出现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在重新审查过去的经验并制订新方法之时，其意义不论多小，也不同于一般。

我无需重述本书的内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已故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为英文版写的序言已明确地阐明本书的主要思想，当然是让读者自己去探讨和评价书中提出的论点。我想说的是，在中文版（如同在1978年出版的日文版）中，除了最初的七篇文章——几乎全部写于六十年代，当时作者仍在波兰生活和工作——还补充了四篇较新的文章：

《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的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试图提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波兰的物价问题和政治》；《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二十年后》——根据欧洲第二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考察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为了解决二十世纪末人类面临的问题，试图提出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增加的几章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写于前一版出版以后，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与阐明本书的主要思想很有关系。这个

主要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牢固的、也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

多年前，我曾有机会(不幸的是这种机会不多)拜读过中国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著作的译文。在最近一段时期中，中国作家们又重新出现在政治经济学舞台上。后来，我十分幸运在1979年12月到1980年1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难忘的访问期间与中国经济学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所有这些经历使我深信不疑：如果条件允许，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分析批判能力。这意味着一篇译成中文的著作可能会遭到深刻的批评。我完全了解，我自己的著作也有遭到这种批评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交换观点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唯一所能期待的途径，反过来，社会科学理论的真正发展又是建设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W·布鲁斯

一九八〇年二月于牛津

英文版序言

布鲁斯教授的名字逐渐为我们所熟悉，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国家，都是由于：第一、1956年的小册子《价值规律和经济刺激问题》；第二、1961年题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的比较大部头的著作，对关于计划经济中的市场作用的争论贡献了重要的新思想和崭新观点的结果。^①第二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重要理论上的争论——即二十年代中期苏联的争论，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争论，以及斯大林死后五十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计划化的经验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在波兰的争论。

不过，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和随笔，不仅对关心东欧各国计划经济中六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有关问题的人，而且对更大范围的人来说也是感兴趣的。下列某些论文和经济改革有关。但那些论文（事实上如同作者所强调的）同斯大林死后，特别是1956年以后在东欧各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所进行的争论相联系，也和更广泛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工业内部的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有关。我想大多数读者会由于作者把问题公式化和进行讨论时的坦率、无所畏惧、明晰性和平衡感而有强烈的印象。这种坦率程度是以前在这一类的讨论中很少看到的。

他的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是在作者从1956—1962年差不多同时担任了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

司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期间。在这样的地位上，他是已故奥斯卡·兰格 (Oskar Lange) 教授的亲密同事。在起草1956—1957年波兰经济改革（当时政府原则上采纳了、但终于未能有效而全面地付诸实施）的一部分草案时，他和另一位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 (Michal Kalecki) 也合作过。所以，他不仅是作为理论家，而是带着计划化和经济管理问题的若干经验来说话的。战前，他是华沙自由大学学经济学的学生、二次大战期间，大部分岁月都是在苏联渡过的，在1956年以前，他继续在华沙计划和统计大学（兰格和卡莱茨基两人有一段时间也在这里任教）学习，随后登上了讲坛。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还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附设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过政治经济学讲座。1968年以后^②，担任住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在作为格拉斯哥大学客座人员留在英国。^③

从本书中选出某个特定部分或思想来进行专门论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如果要试图这样做，那末作为值得特别考虑和议论的问题，下列各点应引起英国读者的注意。第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作为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就解决了的行为的这一概念。这个概念中有随后需要继续向前“加深它的社会性——这是和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总体有关的发展”的含意〔对德热拉斯 (Djilas) 和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的某些尖锐评论，也是在这个上下文进行的〕。第二，他对于和分权有关的种种论点的论述。这是明确地在第一章中进行的，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也有所论述。第三、特别在第五章中他所强调的关于在社会主义计划化中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的互相渗透（必须抵制在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想要从政治经济学中排除这两个术语中任何一

个的倾向)。最后，是从意大利《再生》(Rinascita)周报译出的关于1970年12月波兰事件的、他的启发性(即使可能是有争论余地的)分析。在此出版英文版之际，谨向作者、译者和出版者一同表示祝贺。

莫里斯·多布

注 释

① 两本书都是由华沙国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后者在1970年出法文版，1971年出德文版，1972年出英文版(1971年出日文版——中译者)。

② 布鲁斯因与1968年3月的事件有牵连，被免去华沙大学教授——日译者。

③ 布鲁斯现在是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客座教授——日译者。

日文版序言

这次日文版增加了四篇论文，在过去意大利文版（1972年）、德文版（1972年）、英文版（1973年）和西班牙文版（1974年）中是没有的。其中的第一篇《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我在牛津大学经济学统计学研究所的讲义稿，通过这篇东西，试图提供一位经济学史上伟大的智者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其它两篇，《波兰的物价问题和政治》、《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二十年后》，是根据本书中所展开的基本命题的观点，对最近波兰经验中若干方面所作的探讨。这几篇论文最直接的意义是英文版中最后的论文《矛盾和它的解决方向》（是本书第八章）中所分析的问题的继续。

最后一篇论文，《实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是在巴黎讨论“二〇〇〇年的恐惧”的国际会议上所提出的报告。其目的是为了对人类在二十世纪末所遭受的病魔，提出真正治疗的方案，并分析社会主义必须满足那些条件。增加上述四篇论文的理由，决不仅仅因为在各国文版出版以后，有了增补的可能性，而是因为这些论文最好地突出了本书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特征。由于这些论文是本着批判的态度和创新的愿望，著者深盼在社会科学方面受到尊敬的日本读者们能同意这种思想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我从未将我的著作献给过任何人，但这次要破一下这个习惯。我将这本日文版献给住在波兰华沙的爱德华·利匹尼斯基教授。^①这本日文版出版的1978年，正是教授九十岁诞辰。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这样一位人物——他以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培育了好几代研究人员，坚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优良的传统（他的最新著作《卡尔·马克思与现代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他坚持留在最前线，为了实现“富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进行艰巨不懈的斗争。以此表示一点最深切的敬意。

W·布鲁斯

一九七八年四月于牛津

注 释

① 爱德华·利匹尼斯基(Edward Lipinski)生于1888年，波兰经济学界最老的前辈，现代波兰经济学者中的大多数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利匹尼斯基教授在七十二年前，1906年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直到现在他一直是属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所以也是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老前辈。

本书著者布鲁斯失去华沙大学教授职位起因的1968年三月事件之后，利匹尼斯基教授经常提出政治方面的建议，申述改革为当务之急。1976年4月底，他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一封公开信，恳切陈述必须作出政策的改变，而盖莱克是他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后辈。布鲁斯在本书的第九章中论述了教授所提出的警告的正确，仅仅在两个月以后(1976年6月底)，发生了物价暴动事件，就获得了证明。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W·布鲁斯	1
英文版序言·····	莫里斯·多布	3
日文版序言·····	W·布鲁斯	6
第一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分权的若干一般 问题·····		1
第二章 经济刺激、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的发展·····		22
第三章 经济改革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方面·····		32
第四章 商品物神性和社会主义·····		45
第五章 经济计算和政治的决策·····		71
第六章 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81
第七章 社会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与政 治的关系·····		98
第八章 矛盾和它的解决方向·····		124
第九章 波兰的物价问题和政治·····		136
第十章 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二十年后 ——接受爱扎克·多伊察奖纪念讲演·····		140
第十一章 实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 ——对二十一世纪来说社会主义意味 着什么·····		153
译后记·····		166

第 一 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分权的 若干一般问题^①

至少有十年之久，计划经济运行体制的发展问题，在波兰成了广泛而又活跃的讨论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纯理论方面或实际方面，都进行了极为全面的议论。在1956—1958年曾经达到了一定的高潮之后，争论暂时沉寂下去。但是，最近两年重新又被提出来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运行体制加以必要的变更，现在成了首要考虑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不仅是波兰，而且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来说，也是适用的，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

曾经成为议论对象的那些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们的重要性，这个事实表明：计划经济运行体制某些制度上的变更的必要性，是从经济生活的现实本身产生的。

全面衡量一下波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二十年的经验，显然是肯定的。波兰属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很高的国家之一。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所完成的社会的、经济的变革，规模是巨大的。如果考虑到极为沉重的战争损失，那末，肯定的整个图景就更加清晰了。如果再同战前的波兰以及二次大战后大致从同一发展水平出发的其他许多国家比较

一下，那就特别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波兰的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以及关于在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所用的具体的制度形式没有理由去进行批判的分析。如果把潜在的可能性同实际成绩结合起来考虑，那末，应该深思熟虑的范围就更大了。当初，曾经主要地在由经济管理的各个阶段的行动方式所决定的主观因素中，去寻找某些否定现象的原因。不错，这种因素始终都有某些意义。可是，如果更深入分析一下，那末，马上就会弄清楚，除了主观的方面之外，必须考虑到重大的制度上的种种因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般原则，不是只有通过一经建立就永远不变的单一的制度形式才能达到，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当然是在一定的规范之内）也是可以实现的，这种看法已逐渐取得优势。如果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别，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就更清楚了。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有实现各种不同体制的解决方法的可能性这个思想，虽然提出了若干基本问题，不过通常是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经济决策的集权和分权这个领域来理解的。然而，这种理解方法所以能够被接受，只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不仅把纯粹组织的方面，而且把经济的方面——首先是计划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为全面考察的对象。

这一类问题的出现，同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某些实际尝试联系起来，不仅在社会主义各国，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引起了关心的浪潮。在西方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新闻性强的文献中，它的解释不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尽管努力是集中在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的改进上面，但却有人试图把这个争论描述为好象是从计划经济本身倒退的一种兆头。

这篇文章，试图叙述一下波兰的争论中所提出的主要论点。不过，笔者的意图不是要做全面的概括，而是要以自己的观点指出问题的所在。不用说，笔者的理解方法，对于许多参加过波兰争论的人们来说，可能都是有议论余地的。由于明显的原因，希望读者也能体谅这里与其说是全面的分析，不如说是以概要的形式来论述问题的。

社会主义经济的集权和分权问题的现实范围

计划化和执行计划过程中集权的决策和分权的决策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不是从地区观点，而是从可以叫做按部门的分权化，即从国民经济、工业、部门、企业这样的观点来进行考察的。为简单起见，这里把中间阶段撇开，仅仅来论述“中央级——企业”的关系。但是请注意：“企业”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个别企业，也包括大企业的联合。

社会主义经济的集权和分权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有必要从限定其范围——把范围限定在具有普遍适用性——开始。这里，我们假定经济已经完全社会化了。就是说，生产资料全部是公（国家）有制，个人收入的唯一来源，除了年金、奖学金、身体残废者的补贴等社会保险费或类似的预算支付之外，假定都是在公有企业或机关中的劳动。只有在一点上，这个假定要加以修正，那就是包含了关于小规模私人生产——主要是农业——的若干议论。

从定义的本身来说，社会主义经济至少是需要把某些种类的决策加以集中的。经济决策的中央级即“中央计划当局”的存在，是这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特征。中央一级按照特定的目的和行动准则去行动。我们假定——这是从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解得出来的——这些目的和准则是

和公共利益一致的。因此，中央的决策所依据的经济计算，是宏观经济的方法，就是说，供选择的方案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观点来考察的，而不是从特定的领域、部门和企业的观点来考察。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另一个特征可以加以补充的，是动态的和长期的标准占优势。

作为做出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的中央一级的经济计算，主要是具有所谓“直接的计算”——即作为基础资料的来源，不以市场的标准为依据，而是原则上按实物量所做的计算——的特征。^②关于长期增长率的决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的决策，对各个生产部门的投资的大致分配，与此有紧密关系的最终产品的未来构成——也是大体上的——问题，消费基金的分配原则等等，这些决策，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既不是也不能来自市场的信号和标准为根据而做出。这对于长达十五年到二十年的长期计划，尤其适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忽视市场的或准市场的标准。如果考虑到以根据反馈而修正的必要性为前提的逐次近似接近法(Procedure of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s)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更是这样了。可是，在做出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和长期决策的过程中，市场的种种量所起的作用，同遵循一般所接受的发展路线的、可能利用的资源和符合期望的结果之间的直接对比这个第一位的要素相比，总是第二位的。^③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作者认为，包括南斯拉夫型在内，对于某些类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说，“中央计划当局”对于组织结构的所有其他构成要素有必要保持其较高的地位。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等级制的关系与垂直的联系，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计划经济不能仅仅依靠通过以市场为媒介而建立的水平联系。

然而，这还不等于已经解决了集权的范围问题。因为那决不等于说，计划经济因此就必须经常把一切决策加以集权化并仅仅通过垂直的联系来进行操作。

首先，必须考虑由个人（家庭）做出决策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这里所包括的是：职业和工作地点的选择，以及熟练程度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等，即关于劳动过程中所谓活动等级（degree of activity）问题的决策和关于选择消费资料的决策。这个领域的种种决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与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相对应的另一极。一般说来，后者的决策（宏观经济决策）是在中央一级进行的，而前者通常是用分权的方式做出的。除了明显的例外情形之外，没有理由不能把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的自由，以及关于选择消费结构的自由，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不可少的特征。因此，任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必须包含某种范围的分权的决策。这件事情与一个重要的归结相联系。即由作为受雇者和消费者所做出的决策的分权化，至少关于这个领域，要求运用市场形式是必然的。在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对象的一部分西方文献中，根据这样的理由——受雇者和消费者的决策是已经由关于个人收入的规律和结构，劳动力的需求，消费资料的供给等等的中央决策，事实上决定了的，——对劳动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的重要性估计过低。这种看法看来是不正确的。第一，即使依赖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单方面的，那对特定个人（家庭）的行动自由来说，也还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在总量（aggregates）必须去适应事先已经给定的结构这种状况下，市场形式也将容许个人的多样化。但是，用这样狭隘的方法去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将是错误的。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的自由，以及选择个人消

费类型的自由，通过市场机制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和最终生产的结构发生反作用，从而也——至少，在同社会偏好的最优类型可以并存的这个限度内，——对宏观经济的决策发生反作用。

然而，劳动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对生产的影响力如何强的问题，不仅取决于这些市场同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取决于宏观经济决策领域和个人决策领域的，可以说处于中间一级的决策方法。这里所包括的，是把总的发展模式 (Pattern) 具体化为短期 (即年度) 计划，是确定特定部门和企业的产出计划、投入结构的细节、供给来源和销售方向、具体的报酬制度等问题。不错，在这一级上的解决，已经由中央的宏观经济决策决定了总的轮廓。尽管如此，在已经给定的一般指令的范围内，还是留有很大余地，可以从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向中间进行选择。而按照作者的意见，这就使得把常常叫做经常的或局部的决策的中间组 (group) 加以个别处理这件事情正当化了。关于这一组的决策，事先不能说它们是应该用同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一样的方法，即直接在中央一级来做呢，还是应该交给社会化了的企业——这个“企业”的名称下面可能要包括部门组织 (branch organizations) ——去做。在后者的情况下，会出现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新领域——“中央计划当局”同企业之间的新领域。这件事情又会导致一方面是劳动和消费资料市场，另一方面是社会化企业间的市场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大大增强。

概括上述议论，可以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集权和分权的范围问题，通过把一切经济的决策区分为三个组，进行图式上的理解 (schematically approach) 是可能的。